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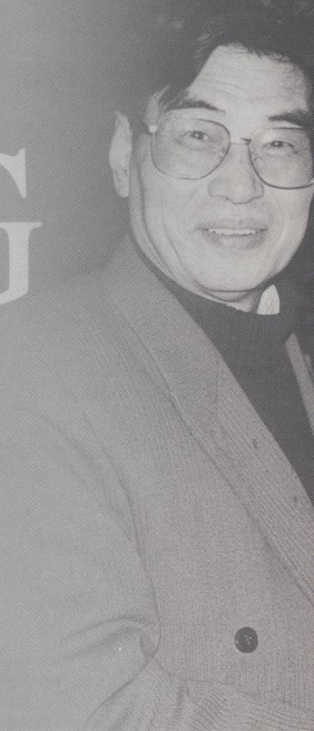
凤章文集

第一卷 中短篇小说

ZHONGDUANPIANXIAOSHUO

FENG
ZHANG
WENJI

凤凰城传媒集团
文艺出版社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凤章文集

1

中短篇小说

ZHONGDUANPIANXIAOSHUO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章文集/凤章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5. 10

ISBN 7 - 5399 - 2108 - 0

I. 凤... II. 凤...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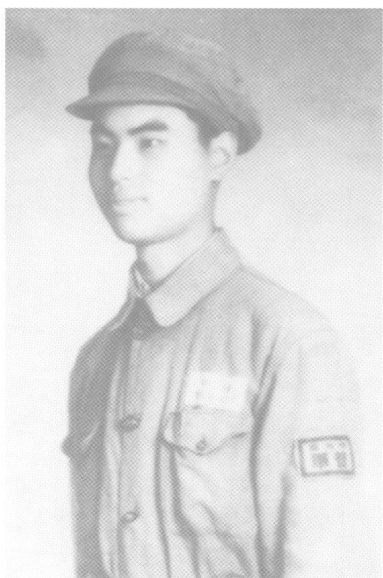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7452 号

书 名	凤章文集
著 者	凤 章
责任编辑	郭济访
责任校对	文 莱 夏 天
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5.375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5399 - 2108 - 0/I · 1994
定 价	100.00 元(全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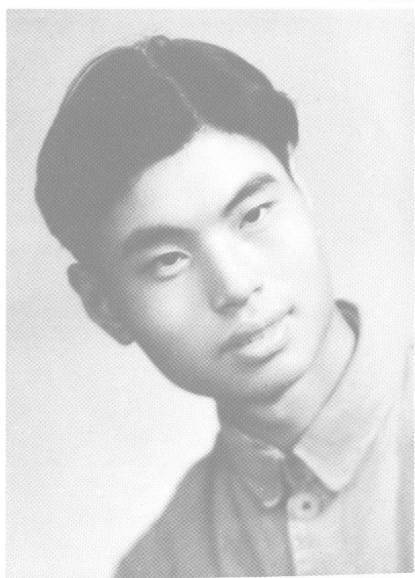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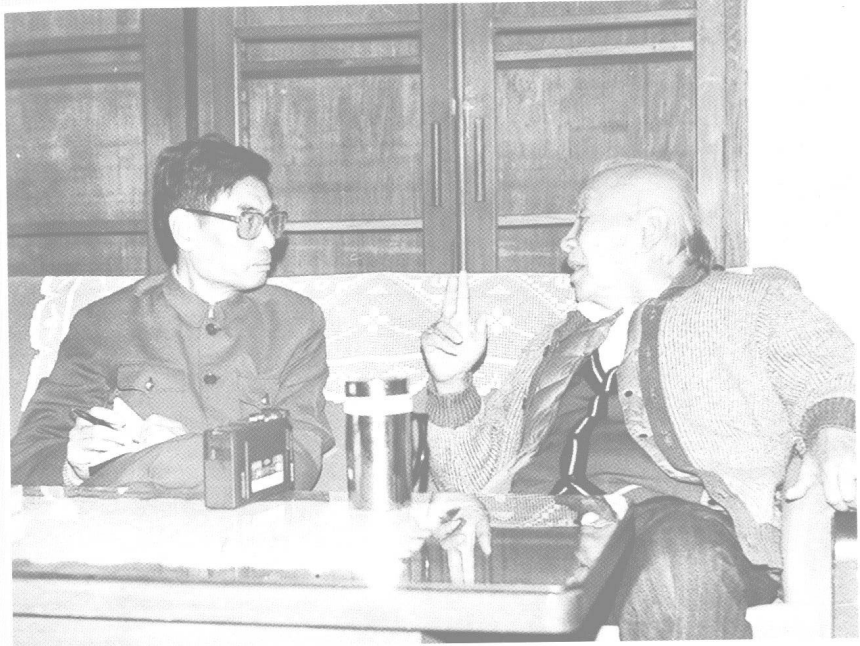
凤章近影。



1949年摄于苏州解放时。



1950年摄于苏州《新苏州报社》。



探望艺术大师刘海粟。1981年摄于上海复兴中路刘海粟寓所。



1985年4月摄于南通港。右起凤章、峻青、庞瑞垠。

总 序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二周年之际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创造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文艺工作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也是每个文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庄严使命和神圣职责。

本着这一精神,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江苏老作家文集”。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半个世纪以来,江苏老作家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为人民奉献了大量精品力作,不仅创作成果丰硕,在当代文坛上成绩卓著、享有盛名,而且有着很高的人生和人格追求,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独特的地位。老作家们以各具特色的作品在江苏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精彩的一页,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尊重。

编辑出版“江苏老作家文集”,保存老作家们一生创作的辉煌结晶,是对作家创造性精神产品生产的一种展示和肯定,是对作家

个体创造性劳动的一种尊重和鼓励。阅读研究老作家文集，不仅能让后人从中汲取丰富的文学智慧和艺术营养，而且能从老作家身上获取闪光的人格力量和思想力量。所以，今天我们编辑出版老作家文集，也是一项文学资源的保护性工程和文学积累的建设性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在省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经省作家协会具体组织，由宣传部、作协和老作家本人三方通力协作的“江苏老作家文集”出版工程，与新世纪的到来同步启动。2003年，《高晓声文集》、《艾煊文集》、《海笑文集》相继出版。2004年，我们又专门成立了“江苏老作家文集”出版工作小组，顺利完成了第二批老作家文集的编辑工作，并与江苏文艺出版社建立了出版“江苏老作家文集”的长期合作意向，为今后更加规范持续地出版“江苏老作家文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江苏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悠久的文学传统，在江苏这块文学的沃土上，涌现过一代代名家、一部部名作。当前，“两个率先”的江苏，更呼唤率先发展的江苏文学，肩负着时代和历史重任的江苏当代作家，理应发扬老一辈作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由“三贴近”而“三融入”，从改革建设的火热生活的实际感悟中，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中，激发创作灵感，创造无愧于伟大时代和伟大人民的审美篇章，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美的精神食粮。让我们用自己手中的笔，去美化人们的心灵，去点燃民族精神的火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江苏老作家文集编委会

2005年6月

序

陈 辽

新中国成立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全国有数以百计的青年作家。到了二十一世纪，这批青年作家大多已是七十多岁高龄，至今坚持创作仍有佳作问世的，已经屈指可数了。而凤章则是其中的一个。撇开身体健康因素不谈，这批上世纪五十年代成名的青年作家，如今之所以只有少数几个仍在从事文学创作，是因为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他们中的不少人在文学列车的前进途中，于不同的路段上，有的是因为“外力”，有的是由于“内因”，先后离开了文学列车。

一九五五年肃反扩大化，被认为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一些青年作家被迫离开了文学列车。新时期到来后，他们之中只有个别人（如天津的林希）才重新登上我国的文学列车。凤章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无牵涉。

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一大批青年作家被错划成“右派”，他们也被迫离开了文学列车。直到新时期到来后，其中的一部分作家才复出，被称为“复活的作家群”。但在二十年间，他们的身心受到了极大折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他们已老且弱矣，“复活的作家群”中，还能坚持创作的少而又少了。“反右”中，凤章被认为犯有“资产阶级办报方向”的错误，已作为“右派”上报，只因主管文教的一位市委领导的保护，他才幸免于难。

“文革”期间，凤章也和其他作家一样，受到了冲击和迫害，遭致家破人亡，自己又险历图围之灾，又是因为一位同志的舍身保护，凤章得以渡过此劫。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五十年代成名的一部分作家发觉自己的作品怎么写也发不出去了，方才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观念落后了，于是他们也离开了文学列车。而对于凤章来说，八十年代正是他的创作的黄金时代。以《路的呼喊》、《法兮归来》等作品为代表，佳作迭出，凤章又跃上一个创作高峰期。

及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五十年代成名的作家中又有一部分人因观念滞后，作品难以发表而离开了文学列车。而凤章却在九十年代写出了全国文坛瞩目、反响巨大的作品《张家港人》。

进入新世纪，思想观念的更新加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名的作家中又有一部分人自觉跟不上时代潮流而放弃了文学创作，而凤章却在新世纪写出了长篇小说《公道》。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除了“文革”十年外），凤章始终在我国的文学列车上从事创作。他的创作成果不只是新中国文学成就的一部分，而且经受了时间的检验。他的成功奥秘何在呢？读了四卷本《凤章文集》，我找到了答案。

一

与时代共进但又和时代前进中的主流拉开距离，保持独特的创作个性，这是凤章半个多世纪创作长盛不衰的一大原因。

凤章（1930— ），原名滕凤章，一九四九年年初在盐城老解放区华中大学学习并参加革命。渡江战役后进入苏州，后在《新苏州报》任副刊编辑、主编。一九五〇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小说《慰问袋》，在巴金、唐弢

主编的《文艺新地》杂志(一九五一年五月号)发表小说《小淘》;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单行本《第一批卖粮船》(1955)、《两个加油工》(1956)和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六十五夜》(1958);接着,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铁水长流》(1959),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传达》(1960)。一九六五年作家出版社又为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彩霞万里》,共收短篇小说十二篇。小说《彩霞万里》后被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水港桥畔》等数十篇散文发表后又脍炙人口,凤章同时被认为是知名散文作家。《水港桥畔》后来也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凤章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都是他深入工厂、深入农村生活后的艺术结晶。《彩霞万里》小说集中的小说,写的是工人和基层干部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悲、欢、喜、怒,他们的劳动、创造,虽无离奇曲折的情节、惊心动魄的传奇,但普通劳动者的内心美,高贵的品德,美好的情操,却被凤章真实、具体、历史地揭示了出来。《水港桥畔》等多篇散文,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江南城乡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凤章的散文以细致、优美的笔触描绘了水港桥畔、山坞果林、花丛秀春、古城织锦、虎丘种花、近海捕捞等等多方面的现实生活、祖国的新人新事新气象,读者可以在凤章以小见大的艺术描叙里感受到其中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作为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作家,他对新中国的诞生,洋溢着由衷的喜悦;他对新中国成立后工农群众的解放和他们在新生生活中的主人翁气概表示真诚的感佩。但是,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日子里,敏感的风章即已觉察到人民代表与政府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在《人民代表》这篇小说(一九五四年三月写作)中,他叙写黄师傅当选为人民代表后,即积极反映工人们的意见:全厂一千人一致要求,把城区和工厂区距离缩短,在南门河上造一座大桥。开人民代表会议时,黄师傅带去了“这么一个提案”。可是市政府却以不能“百废俱兴”为由将这一提案否决了。这回,黄师傅第三次当选人民代表,工人们再次要求:“老黄,造桥的事你不要忘

了，你看我们这排工厂多需要桥！”黄师傅身为人民代表，也充分意识到：“南门造一座桥，很重要。南门是城乡物资的吞吐口。南门外有五个工厂，上万个工人，怎能没有一座桥？”这次，黄师傅直接向市长提出，市长不再以不能“百废俱兴”为由拒绝造桥，而是作了如下表态：“我们不瞎用钱，要把钱用到刀口子上去，造桥的事这回一定要详细讨论的。”在人代会闭幕的前一天，李市长向大会报告了下半年市政建设计划，接受了人民代表黄师傅提出的提案：在南门外造一座大桥，并且在大桥附近建设几个码头和仓库，使得南门成为来往旅客和城乡物资交流的吞吐口。人民代表要真正成为人民的代表；人民政府要重视人民代表的意见并接受人民代表的监督，在《人民代表》这个短篇里，凤章在半个世纪前即提出了这个大问题。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作用。回顾凤章在半个世纪前写的这个短篇，我们不能不佩服凤章对生活的敏锐感触和先见。

有了这样的以人民为本的思想，所以凤章于一九五八年在刮“左”风的年代里，虽然也多少受到一点影响，但总的说来他的头脑是比较清醒的。一九五八年他创作了《六十五夜》，写苏州红星钟表材料厂凌毅平技术员，以六十多个夜晚研制成功宝石钻孔机，在第六十五个夜晚终于试制成功宝石轴承的故事。作品着重刻画的是凌毅平的科学精神，他曾经经历过失败，但他找到了失败的原因，解决了定位器的问题，终于试制成功了宝石轴承。作品不是随意编造，而是以苏州现实生活中的自制宝石轴承成功为基础，而又突出凌毅平的“攻坚不怕难”的科学钻研精神，所以和一九五八年流行的那些赞颂“放卫星”、“亩产十几万斤水稻”的文学作品是根本不同的。今日阅读这篇作品，我们仍为凌毅平既有赶超国际水平的雄心壮志又有冷静攻关的科学精神所感动！

十年“文革”的梦魇时期过去，凤章迎来了创作的黄金时期。他与时代共进，而且在某些方面走在时代的前列。他在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初比较早地在《家庭小夜曲》中提出了不能让物欲横流的问题。黄仲魁因落实政策补发了一笔钱。大女儿蓓蓓准备结婚，提出了要买彩电，要妈妈把那串金项链给她；小女儿珠珠声明：“姐姐结婚有什么，将来我也得有什么。缺一样我不答应。你们可别偏心。”儿子强强已经用爸爸的钱买了一辆“嘉陵”，但他还想伸手要钱，不过他表示：“我将来会把钱还给爸爸的。”“这个幸福家庭的晚餐，不欢而散”。“黄仲魁突然感到筋疲力尽，极想倒下来痛痛快快地睡上一觉”。名为“家庭小夜曲”实为子女争父母钱财的“家庭闹剧”不是至今还在上演，而且愈演愈烈吗？《换脑人》更是一部较早提出反腐败的中篇小说。作品通过“植物人”市经贸委主任何世成与遭车祸而死的大学讲师杜俊强换脑后的荒诞故事，揭露出了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杜俊强借何主任的身体“复活”后，以大学讲师的思维方式处理经贸委特权占有出国人员名额问题；家里儿子要老爸批条子他不干的问题；老婆把可以住人的房子作为鸡窝他反对的问题……于是遭到经贸委郭代主任和邱、吴两位副主任的联合进攻。父子对立，妻子又要和他决裂。最后，“复活”的何主任竟作为精神病患者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何主任在住院前机关里制定的肃整机关作风、考勤考绩、岗位责任等等制度，像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落在水里，在无声无息中消失……”如此写反腐败的斗争，不但不落入其后反腐斗争小说的常见模式，而且深层次地展现了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在《债谜》里，又是凤章较早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诚信问题。小说中的唐士年固然言而无信，借钱不还，实则攫取显影剂技术的所有权；就是那位真正的债权人汤尧民厂长，也始终给你一个“闷声不开口，神仙难下手”，不肯还债。唐士年老脸皮厚地说：“一个企业的资本的积累，总是带点血腥味的。”为他的不讲诚信狡辩。但是，假如企业家大多不讲诚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将怎能正常地运行呢？“秦表姐（按：小说中借五万元钱给唐士年的妇女）将如何才能应付那几

位退休职工呢？这一关如何过啊！”凤章对不讲诚信的欺诈行为进行了严正的谴责。

凤章对文学领域里的与时代的前进方向相悖的支流，同样采取了抵制、反对的态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文学领域里出现了五大倾斜：一是向“无思想、无主题、无倾向”的“三无”倾斜。二是向卑劣倾斜。剽窃别人创作成果恬不知耻者有之；为“大款”、“大腕”树碑立传，无限拔高，只是为了取得高额稿费者有之；充当富婆、明星的“枪手”，无中生有，无事生非，无理取闹，捕风捉影，以分得巨额版税收入“一杯羹”者有之；因“文”出名当了官，养情妇、包小蜜，贪污受贿者有之；更有个别文人在作品中推销“售肉经验”，当别人批评这是“妓女文学”时，作者竟自称“我就是妓女”。三是向平庸倾斜。这几年间，文学界讲使命感的人越来越少了，文学平庸的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四是向吹捧文化汉奸和附逆文人倾斜。弘扬民族精神的少了，为汉奸文人周作人以及某些附逆文人曲辩的多了。五是向“小鬼文学”（少年儿童写的作品）倾斜。“大人文学”处境很困难，如果不写性，不写暴力、枪杀，不搞胡编乱造，不写宫闱情变，不写宫廷斗争，帝后勃谿，很难出版。另一方面，一些少年作者写的作品，甚至六岁半的女儿童作者写的作品，却“火”得不得了，全都成了“卖点”。凤章对于这样的文学“倾斜”，绝不趋时，你倾斜你的，我还是坚持思想性、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还是主张文人应该清高，应该有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还是要弘扬民族精神。文学史上有个别少年曾在年幼时写出过一两首较好的诗作，但少年写出高质量小说的却从来不曾有过，因为小说需要丰富的生活积累、思想积累和文学积累，还得益于创造性的艺术才能，这都不是一个少年所能做到的。因此，凤章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所写的一二百万字的作品，尤其是那部写出张家港精神“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被誉为“高歌民族脊梁的诗”、“点了一把灼热的时代之火”的《张家港人》，都是与时俱

进但绝不趋时之作，经受住了时间与读者的检验。

二

给老百姓画像，帮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请命，这是凤章半个世纪来创作长盛不衰的又一重要原因。

统观凤章的作品，写的全是老百姓、普通人：普通的工人、农民、普通的知识分子。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里没有“高官”，八九十年代的作品里没有“大款”、“大腕”，没有帝后将相。因为凤章有他的文学观。第一，在他看来，历史归根结底是由老百姓、普通人创造的、推动的，他们才是历史的主人。第二，他不反对别人写“高官”，写“大款”、“大腕”，写帝后将相，只要写得好，一样能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是他不熟悉这些人，不熟悉这些人的生活，而凡是他不熟悉的人和事他就不想写。第三，他服膺鲁迅说过的话：“……为民请命的人……是中国的脊梁。”因此他要以文学作品“为民请命”，为正义呐喊，这在他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中，尤其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体现得特别鲜明。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凤章写普通工人的《两个加油工》，写老保全工的《不会忘却的山歌》，写织绸挡车工杨梅的《彩霞万里》，写传达老法的《传达》等多篇小说，即为老百姓、普通人画像而为读者称誉。作品中的那些普通人的高尚的精神风貌拨动了读者的心弦。经过十年“文革”，凤章觉悟到，歌颂老百姓，为普通人画像，只是为老百姓、普通人说话的一方面，而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作为一个作家，还应该为民请命，说出老百姓、普通人想说而一时难以表达出来的心里话，为老百姓、普通人呼吁、求助，解决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他在新时期的创作中，尤其是在报告文学中便把重点放在了为民请命上面。

《路的呼喊》（后被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一文，通过宁六（南

京到六合)公路建设中存在问题的揭示,义正词严地提出,“人民有权追查这件事”：“短短二十几公里的路,造了三年时间,花去国家资金二千九百五十万元(按: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民币的价格),还有成千吨钢材,成千立方米木材,上万吨水泥,五千多吨沥青,可是,通车以后还不到三个月,便‘全线崩溃’了。这条号称目前我国高标准的一级公路,一下变成了‘高颠’公路、破烂公路、豆腐渣公路”。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宁六公路动工后,“一些单位把宁六公路工程当成大肥肉,你割一块,他割一块,我再割一块。大家抢着割,轮着割。经手三分肥,不割不甘心,连那些不沾边的,也要捞上一大块。你想想,这路能造得好吗?”最奇特的要数省交通厅和宁六工程指挥部。它们一个是具有审批、监督权的上级领导机关;一个就是宁六公路工程本身的指挥要关,竟也合伙割起宁六公路这块“大肥肉”来,而且胃口很大,一下子就从工程拨款中提取了四十万元,去建造职工宿舍。为了弄到这笔钱,两家还合演了双簧戏。指挥部打报告要求造房子,交通厅马上批准拨款。待等统筹建的房子造成,两家平分,各得一千平方米房屋。这是用“合唱双簧”法“割肉”。此外,还有浦口区工程处用的是“移花接木”法“割肉”;六合县交通局用“偷梁换柱”法“割肉”……风章最后写道:“我好像又驾车在宁六公路上行驶,听到从车轮下面发出的喀嚓喀嚓的声音。那是路在呻吟,在呼痛!不,是路在激愤地呼喊、发问: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里,为啥我会遭到这样的命运?”“不把‘割肉’之风的根源找到并把它铲除,不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那些蠹虫挖掘,则不管是一级公路、高速公路、五光十色的彩色之路、向‘四化’进军之路,恐怕都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路的呼喊》一发表,舆论哗然,宁六公路问题得到严肃处理。后来建设的宁六高速公路则受到公路乘客们的赞扬。风章为民请命产生了显著效果。

《法兮归来》则是另一篇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品写两位无辜者

被判死刑。两名“死刑犯”即将被枪决前，铜山县检察长张禹廷发表了和议题“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完全相悖的意见：“这两个死刑，现在不能执行。”其后查究的结果，错案得到了纠正。两位刚正不阿的法官孙自魁、孟昭培起了主持正义的作用。但是，孟昭培不再干问案的事了。当然不是撤职，而是被“借调”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去了，美其名曰前去“加强”，其实无所事事。“人民需要法！人民需要张禹廷这样的检察官！人民需要孙自魁、孟昭培这样的法官！”“社会主义的法制正在逐步健全，让我们用法律的圣水洗掉那些亵渎法律的污垢吧！”“法兮归来！法兮归来！”凤章再一次为民请命，他代老百姓立言的“法兮归来”也是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时代的到来在强烈地呼喊！

此外，他在《“球籍”问题——兼记中国大学教授们》中，提出了中国在地球上的“球籍”问题。认为要解决好这个“球籍”问题，必须重视和解决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价值问题，提高“教育”在中国的地位。凤章进而为知识分子请命，为教授们（他们现在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老百姓）请命：“哦，‘球籍’！‘球籍’！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将会如何呢？我的龙的中国啊，莫再倾斜！”在另一篇报告文学《上告》中，凤章为一个被县委书记强奸的女子请命，最后，那个县委书记阎长印以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在《倾斜的官司》中，他为遭受一场突然而来的奇特的官司的一名女编剧请命，最后，那位女编剧打赢了官司。

千万不要以为，凤章为民请命总是一路顺风，畅通无阻。不！他在“为民请命”中遇到了很多、很大的阻力，有时写好的文章被勒令停止刊登，但他不屈不挠，努力奋斗，直到正义终于得胜后才罢休！

如上所述，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他的《家庭小夜曲》、《换脑人》、《债谜》较早提出如何防止与反对物欲横流问题，较早提出反腐败问题，较早提出诚信问题，这也是为民请命。在新世纪创作完

成的长篇小说《公道》，则不只为小说主人公祝梅兰讨还“公道”，更为一般的老百姓要求法律公道、法制健全的公道。简言之，凤章为民写作，为民请命，已成为他的一种创作自觉，这是他创作成功的又一奥秘。

三

半个世纪来，凤章不只在作品的思想性、真实性上下功夫，而且同时在艺术上花力气，这是他五十多年间作品始终拥有广大读者的另一原因。

凤章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创作中，构思领先，十分重视作品的构思。文学创作中的艺术构思是什么？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艺术构思，犹如指挥员在作战过程中的战斗计划一样，它组织着和支配着主题思想的提炼和深化，情节结构的设计和安排，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和塑造，以至整个作品的节奏和密度，甚至某个标点符号的使用的全部创作计划。在创作过程中，部分地改变原来的构思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原来的构思，以至形成全新的构思，也是间或有的。凤章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创作，其主要成就也就在于他在创作过程中的艺术构思越来越认真，越来越努力，特别注意对主题思想的提炼和深化，情节结构的设计和安排，而对于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和塑造却用力还不足。《人民代表》就存在这个问题。但从《两个加油工》起，他就开始在艺术构思中注意起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和塑造了。《两个加油工》中的李进度和宋平平，他们对于不同事件都有不同的做法、说法和想法，而且带有鲜明的性格烙印。就说加油吧，“李进度就像布机上的梭子那样灵活。上班以后，只见他在布机中穿来穿去，很快就加好了一排车。”而宋平平却像一把木匠用的“钻子”，他努力追求的是加油的实际效果。这两个加油工的不同性格，更突出地表现在他俩以不同的观点和方式